

《穷棒子王国》案

新格斗

戴煌
编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格斗/戴煌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0. 1

ISBN 7-80616-839-7

I. 新... II. 戴...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777 号

新 格 斗

——《穷棒子王国》案



编 著——戴 煌

组稿编辑——成 江

责任编辑——乐惟清

封面设计——双 对

出 版——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 64515005 传真: 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文庙路 120 号)

电话: 63779027 传真: 63768540

印 刷——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11

字 数——256 千

插 页——6

版 次——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0000 册

书 号——ISBN 7-80616-839-7/I·301

定 价——19.80 元

序

张思之

历史证明：强权一旦包庇邪恶，合污同流，轻则殃民，重必祸国。我们在这方面的教训之深，何尝不是史无前例。这本《新格斗》以它鲜活生动的实例，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映了、阐发了这种教训的内涵，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作者戴煌，谊兼师友。每读他的文章总会想到《灵鸟赋》中的警句：“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千年以来，范文正公留给后人的鸣默之择，鞭策与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然而尽人皆知，在当代中国，这种选择千真万确是会以死生为代价的。戴煌因常“鸣”饮誉四海，也为此一生九死。

生命的存在都有自己的格局与形式。综观戴煌的生命轨迹，朝晖晚霞，“呐喊”一词应是较为精当的概括。他口诛神化，笔伐特权；为民请命，为冤辩诬；为党分忧，为国排难；几十年从不稍懈地涉水跋山，不平则鸣，满腔豪情，正气浩然。这些言之虽易，行之却不易！四十二年前能在神龛之前挺胸道“不”，雄立唱“否”，需要何种胆识？又是何等气概！即在今日，几人能够？！他是记者，党的“喉舌”，发出不能搞“神化与特权”的雄鸡一唱，宛如惊蛰春雷。然而楼高独倚，谁与之共！偶有谏者，或流或斩，即或哀鸣，也网入另册。从此千里秋风，寒蝉沉响；百花凋零，万马不嘶。他本人饱尝非人煎熬，强忍无边凌辱，子散妻离，服刑投荒；坠入社会底层，常年在饥饿线上苦撑。正值壮年，已是华发苍颜，瘦骨临风，然而童心不泯，初衷不改。“不能只为一

已活在这个世界上……有话还是应该说”(引文见《九死一生》);纵鸣声凄咽,胜于沉默。端的是一个铁骨铮铮的傲岸形象。感激十一届三中全会,“派曾右”(启功先生句)终成陈迹,戴煌处境新变,却故态依旧:不趋炎附势,不投合时风,悲天悯人,一如既往,为维护弱者、冤者的自由权利,为伸张法律的尊严正义,进行了一次次艰苦卓绝的格斗;依然是一片丹心,满身风露。而这番新格斗实质上是对“两个凡是”思潮的一次短兵相接,体现出他“一生长为国家忧”的赤子情怀。

在这场新格斗中,河北王国藩扮演着奇特的角色。王国藩是个社会现象。以“王国藩”命名的农业合作社拉开了一个历史事件的序幕。同山西的那位“大叔”相仿,他也曾以“劳模”名世,生命中闪过亮点。然而可悲的是,他们都没有力量消除或者哪怕是掩盖自己本性中的暗点,缺乏“譬如昨日死”的勇气,却抱着“实在昨日无”的谎言幻影,恃上赐特权,干出了比其历史劣迹更为卑鄙的恶行。诚然,人性的弱点、暗点,有的无损于伟人人格的伟大,此种事例,不绝于书。可是,那些暗点、污点,又万万不可越过道德良心的界限,不能触犯法律规范。须知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社会群体历史的组成部分,因而决不允许对某一“个体”任意地乔装打扮。以《新格斗》涉及的王国藩而论,姑且勿论他在历史上有多少污点,他以合作社领路人的身份蜕化为腐化分子,那卑劣凶狠的可耻面貌,与人民心中崇高、伟大、优美的劳模精神,完全是格格不入的两类形象,谁都无法把它们合而为一。倘若当事者本人想借助诉讼手段达到这一点,必然会自取其辱。谓予不信,请看《新格斗》附录的件件铁证。《新格斗》中的殷大龙是文学现象。我虽不谙文学创作,却也略微有点文学常识,故斗胆浅陈拙见,以为作品行世,似无妨准许“对号入座”;试想如无人对号或竟都对不上号,是否说明作品远离现实尚不

能发挥其干预生活的应有作用？至于对号以后产生何种联想，得出什么结论，那是“对号者”的事情，也允许见仁见智，却统统与创作典型形象的作家无关。历史剧《蔡文姬》的作者说：“蔡文姬就是我——是照着我写的。”（引见作者的《蔡文姬》序）您看，号对得明白无误，欣然入了座。这充分说明：对号又绝不是画等号。有人硬要与小说人物殷大龙对号，我以为是他的自由，即使甘画等号也是一己之私，与创造殷大龙这一文学典型的古鉴兹无干！为繁荣创作计，不知可否将这一条立为规则定成规矩，也省得一些人寻隙兴讼，无事生非。现实的情况是，一有人跳出来“对号”，就有人起来断言作家有责，甚至不惜运用司法权力！长此以往，援引为例，谁还敢集生活原型，按文学创作的规律、规则与手法，去塑造发人深省、震撼心灵的艺术典型？如不改弦易辙，势将把文学艺术作品扼杀在摇篮里。这显然于法理不通，于情理难容，多少正直的艺术大家为此发出了强烈呼声，是不宜充耳不闻的。

《新格斗》的意义还不止于阐述了诸如此类的文学常识，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大量的资料为我们展现出一副现实社会生活的图景：一位当年经伟大领袖亲树的先进典型，居然把一部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化为自己的身影，以此为契机，凭借司法权力掀起了一股“两个凡是”的复辟逆流，人民的法庭于是演成这场格斗的主战场。如此动魄惊心的画面，又令人惊诧莫名。

法律体现着或者包含了公正。治国需要公正的法律；人民需要法律的公正。司法机关的决定如果失去了公正，即便是终审判决，作用也不免等于零，有的甚至会产生负面作用。有些同志至今不理解，不公正的裁决，冤假错案，是社会不能稳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这是让人不安的！

《新格斗》揭示了一场很不公正的审判。它突出地表现在：

对创作典型形象的作家,实行“欲加之罪”;对“对号入座”的现实人物,却花样翻新,来了个“欲减之罪”。尽管二者都不正确,但在这一“加”一“减”之中,正好显露出“欲”中的不公正。查其缘由,盖出于合议庭外有力量支配诉讼的结局和判决的内容,执法人员不得不屈从于幕后压力,丧失了独立与自律,丢掉了公正。书后附录的判词之所以缺乏说服力,甚至不能自圆其说,根源在此。

这里不拟对附录的两份判词作出辨析。忍不住要说的是:即使认为王国藩提出的“对号入座”成立,即使认定殷大龙等于王国藩,又如何?这里借用鲁迅先生妙论作答:

假如指着一个人,说是:这是婊子!如果她是良家,那就是谩骂;倘若她实实在在是做卖肉生涯的,就并不是谩骂,则是说了真实。

既属真实,言之何事?!我无意指谁是婊子,也决不会去给什么人立牌坊,只是想表明:王国藩于得意不久迅即忘形,劣迹恶行,斑斑至于累累,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给我们的党,给党选拔劳模的制度大大地抹了黑。殷大龙何能与之匹敌!古鉴兹的小说有哪一点哪一处败坏了他的名誉?金桂珠律师的法庭辩词相当精彩,直截了当:“如果一审判决书写的殷大龙那些劣迹,王国藩根本就没有,那(殷大龙)就根本与王国藩无关,根本谈不上是否侵犯王国藩的权;如果殷大龙干的那些丑事坏事,王国藩也沾边,那就更谈不上侵犯了他的权。”而且还可以再加上一句:如果硬要认定败坏了他的名誉,这将置党的四级组织给他的严重问题所作的正式结论于何地?

归总来说,这场新格斗中包含的故事,关乎文学,涉及法律,

涵盖众多人物，在一段时间里很有新闻性，更有其易被忽略的政治意义和史料价值。《新格斗》是作者对这场真理与强权交锋的郑重思考和忠实记录。

作为实录，全书反映出戴煌作为记者的才识；稍感不足的是，这种体裁之作，难以透出他的文学功底与艺术才能，倘能据此编成影视作品，不仅会补上不足，而且一定更有哲思，更富诗意！

有人对戴煌的反思之作颇有微辞，作“反思的反思”。言论有自由，褒贬自有春秋。统观戴煌文字，只求明道，不计其功，笔下有德，纸上含情，而且往往发挥得淋漓尽致，读之如闻海上涛声，心向往之，不能自己。读者诸君，幸有同感。是为序。

1999年2月22日于北京

如果说,毛主席过去所肯定赞扬的事物不管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都不容否定,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改革开放、农村生产责任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就都没有立足之地了!

——作者题记

《穷棒子王国》案

法院判定古鉴兹与作家出版社败诉

消息传出,立刻在中国文坛引起层层波澜。
王国藩其人究竟如何?令人生疑:法院再深入调查的倾向性。

1994年10月8日,历时四年又七个月的小说《穷棒子王国》诉讼案,暂告一段落: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小说作者古鉴兹及出版这本小说的作家出版社不服朝阳区法院一审判决的上诉,而维持原判。一时间,文学界和新闻界中流传着一个话题:“恶人告状,好人受怨,真是没道理。”

我静下心来思索,感到导致这样结论的原因,似乎是飘浮在法律之外的另一个影子——“两个凡是”观点的余毒,公民的那支犀利、鞭挞丑恶的笔,在法律的圣坛中却无立足之地,它脆弱,被折断了。我不免要呼吁,法律中需要补充保护正当文学创作者权利的单行法规。

北京市朝阳区法院于1993年3月10日,对这一诉讼案作出的判决是:原告王国藩胜诉;被告古鉴兹和作家出版社赔偿王国藩七千多元,在全国性报刊上向王国藩道歉,小说不得再版发行,存书全部销毁。

对此,被告立即上诉。以文学界为主体的社会反映十分强烈。许多报刊迅速报道,有的综述全案的来龙去脉;有的为作家和出版社鸣不平;有的还扼要披露了王国藩过去的劣迹,说他自己早就毁损了自身的名誉。

这些披露,以大量的历史资料和中组部、河北省委的调查材料证明,王国藩确实恶行累累,民愤极大。只是由于受到当时的

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王金山和唐山地委书记张克让等人的庇护,他才没有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而只被罢免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外一切职务,给了个三级电工待遇,后来应其本人之求,才给他挂了块遵化县水利局“顾问”的牌子。

事隔十余年,即1990年3月,他突然状告《穷棒子王国》一书侵害了他的名誉权。当时他并没看到这部小说,起诉的唯一依据,只是1988年8月北京新华书店编印的《社科新书目》对这本书的简要说明:“靠三条驴腿起家成立农业合作社而名噪一时的黎明社在其成长发展中,社长殷大龙在政治上搞权术整人,在经济上贪污投机倒把,在生活上腐化玩女人……尽管这一切受到本地区正直人们的揭发、抵制和反抗斗争,并经地、县、省乃至中央各级组织审查属实,但殷大龙依然故我,且逍遥直上,个中缘故,只因其是毛主席亲手树立起来的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旗帜。”王国藩认为这些字眼,“使人一看便知所指何人”,使他的“人格名誉遭到极大损害”。

但在1988年,他并未立即起诉,只想方设法制止这本小说出版。1989年春天,小说出版发行时,恰逢发生了那场春夏之交的风波。这位没啥文化但很擅于利用政治气候整人的“老劳模”,便在1990年3月向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递交了诉状,要求法院判令作家和出版社立即停止发行和销毁未售之书,在全国性报刊上向他赔礼道歉,并赔偿他一万元。

消息传出,立刻在中国文坛引起层层波澜

很多人士认为,小说侵害他人名誉权案涉及宪法规定的创作自由和公民人格尊严这两种权利间如何协调的问题。在我国还没有关于文艺创作的单行法规前,法庭审理这类案件时,最好

能够组织文学专家来协助法庭进行文学作品的技术鉴别。

据记者事后了解,法院当初并未受理此案,原因是他们也考虑到王国藩本人问题相当复杂,而且作品主人公的名字叫殷大龙而不是王国藩;同时我国目前还没有关于文学创作的单行法规,审理这种案件无法可依。办事稳妥的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副院长杨承启,建议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出面找王国藩调解。委员会秘书张树英冒酷暑前往遵化找王国藩面谈。张树英以热切诚恳的态度和息事宁人的口吻,劝说王国藩不要再生事端。她说,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闹得纷纷扬扬的了。可是这被王国藩一口回绝,他表示要坚决干到底。同时,他前后多次扬言,他找过好几个中央领导人,上边有人支持他。北京市朝阳区法院犹豫了一年多之后,法院院长易人,上级法院又加以过问,才将这件诉讼正式立案。于是,新闻媒介纷纷报道,文学界权威人士纷纷发表谈话,古鉴兹和出版社也立即应战。

古鉴兹在其1991年6月16日的《答辩状》中说,王国藩起诉的那些说法完全不能成立。古鉴兹的理由是:“穷棒子”一词为我国民间早有,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中就说全国有“六万万穷棒子”;当时被毛主席树为合作化旗帜的合作社,靠一头半头牲口起家的多的是,何况小说中写的是殷大龙为首的二十七户、“三条半驴腿”的黎明社,并非王国藩所在的二十三户、“三条驴腿”的建明社;何况小说中的众多人和事,是他在全国各地了解到的包括在遵化县的所见所闻,集中起来提炼揉合再创作的,完全不是、也不可能再是生活中任何一个实有的人和事。

著名作家和评论家冰心、艾青、冯牧、秦兆阳、冯立三、林斤澜等多人在谈话中,一致驳斥了王国藩的这种庸人自扰。

冰心说,她从未遇到过这种事。这样对号入座又告人家没有道理。法律就是法律,不能有上面有权有势的人就不依法办事。

艾青说,创作就是创作。它的规律是什么?它的原则是什么?它的方法是什么?诸如此类的东西拿到法庭上去打官司,让律师进行辩论,怎能搞清楚?

冯牧说,我看这场官司不能成立。此事已在作家中引起强烈反应,因为这涉及《宪法》中规定的创作自由问题。

秦兆阳说,解放以后,在极“左”路线作用下,用过多少“影射”的罪名,对文艺作品施加过多少棍子帽子!真没想到时至今日,还发生这类事情!如果这种对号入座之风得以流行,以后作家还怎么写作品?

冯立三说,王国藩的一生功过自有公论。如果对这种文学的普遍抽象的批判,他也要苦心孤诣地寻找借口予以抵制甚至诬告作家,那就是怙恶不悛了。

林斤澜更从我国的文字狱谈起。他说,我国文字狱有悠久历史,触目惊心,“文革”中的“小说反党”更记忆犹新。论处小说而不依小说规律,就会走向文字狱……

所有这些谈话,都被中国作协的中国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汇总印送法院,供其审理此案时审慎参考。

王国藩其人究竟如何?

古鉴兹也向法院提供了中共遵化县委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工作组和中共河北省委唐山地委工作组的帮助指导下,于1978年12月25日正式向上印送的《关于王国藩所犯严重错误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以及遵化县委第十九次全委扩大会议和常委会

上,一些同志揭发王国藩问题的发言等二十多份材料。

这些材料所记述的王国藩罪错翔实具体,骇人听闻!小说中所写殷大龙所干的许多丑恶行为,不但王国藩几乎都有份,而且有过之无不及。

比如杜奎,二十三户“建明社”的带头人之一。毛主席盛赞的“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从山上取来’了大批的生产资料,使得有些参观的人感动得下泪。我看这就是我们整个国家的形象”,正是这位杜奎带领二十几户赤贫的社员所为。而从未上山打过一天柴的王国藩,却对由此而成名、和他一道成为全国劳模的杜奎妒忌在怀。

1962年,杜奎出于对党的耿耿忠心,向党组织反映了王国藩的种种劣迹,王国藩对他就更加怀恨。“文革”中,王国藩成了中共中央委员和遵化县第一书记,便肆无忌惮地对这位树立了“整个国家的形象”的真正带头人施以残酷报复。特别在1970年,以所谓“制造拦截外宾汽车的反革命事件”等莫须有罪名,由县公检法军管会将杜奎逮捕入狱,王国藩几次迫使唐山地委重判杜奎。

唐山地委发现这纯属假案,曾两次批示将杜奎释放;地委负责同志还亲自找王国藩做了耐心的思想政治工作,向他晓以利害,王国藩也拒不执行,致使杜奎病势日趋严重。好心的看守所“老管教”袁世增同志提出应让杜奎“保外就医”,王国藩知道后竟对看守所负责人说:“你们还给他治病呢!治不好就算了,还保外干啥?让他死在狱里就算了!”他随之换来一新所长。对王国藩来说,这位名叫张志胜的新所长真可谓得心应手,加快给杜奎送一程;让国民党军统特务在内的一共七个号子的犯人,对杜奎轮番批斗了十四个昼夜,直斗得杜奎在地上站也站不住,猛栽一个跟头瘫倒在地;立即有两个犯人用两根杠子把杜奎夹了起

来继续批斗，直斗得杜奎快断气了，才把他往墙边一扔拉倒。终于，这位与王国藩同在抗日战争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与日本强盗和国民党反动军队作过殊死斗争的老党员，就这样冤死于自己党的牢狱之中！

杜奎死后，唐山地区公安机关要他的确凿死亡报告和医生证明。王国藩派人让医院伪造了个“抢救无效”的证明，蒙混而过。

在对杜奎的这种天良丧尽的迫害中，杜奎的全家老少几乎悉无免灾：女婿黄德录被判刑三年；大儿子杜振贺被昼夜折磨得险乎丧命；三儿子杜振术远逃东北大地；老伴儿张国珍也被关将起来，几天没有水喝而被迫喝尿，最后得隙跳井自杀，骨折成瘫，还被判了两年刑。

杜奎的远房侄儿杜振远，原西铺中学、后改称靠山庄中学的历史教员，也被抓进了遵化县看守所，一关就是七年；当时他拖着八斤半重的脚镣长达六个月，体重由一百五十四斤降到九十八斤，不能挪步，还吐血。唐山地委也曾指示王国藩放出杜振远，王国藩也只当耳旁风；直到杜奎被折磨得惨然死去，地委追询为何而死，王国藩才让杜振远重见天日。

但是杜振远的父亲杜会，抗日战争初期参加革命、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奉晋察冀军区第十五区的命令在西铺村当过地下联络站站长的老革命，著名将领李运昌的老战友，也被王国藩迫害而死。杜振远的母亲赵运珠，抗日战争时期西铺村的第一任妇女抗日救国会干部，也差点被迫害得送了老命。

此外，遵化县委的那份长达八千字的《报告》，还历数了王国藩的这样一些罪错：“一贯打击报复，严重违法党纪国法”；“大搞顺者昌，逆者亡”；“以我划线，任人唯亲”；“干部群众敢怒不敢言”；“独断专行，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实行家长制，搞一言

堂”；“懒馋占贪，生活腐化”；“多次犯过乱搞两性关系的错误，有的情节十分恶劣”；“唐山地震后……身为唐山地委书记之一的王国藩却无动于衷……经常呆在机关防震棚里吃喝玩乐”；“弄虚作假，骗取荣誉，贬低别人，抬高自己”；“把毛主席的批示……用来谋取个人的特权和私利”；“自私狭隘，贪图享受，损公肥己”；“从人民的勤务员变成了欺压群众的官老爷”；“群众说：‘王国藩真霸道，成了遵化的土皇帝’”……

《报告》的结论是：“严重违法乱纪，蜕化变质”，“情节恶劣，影响极坏”。

面对这些确凿的事实，王国藩在《报告》后面签字时也不得不承认：“我同意这个报告和处理意见”。他唯一不愿认同的仅仅是，“关于打击报复问题，我有这方面的错误，但不是一贯的”；“关于男女作风问题，我不同意‘有的情节十分恶劣’提法”，如此而已。

1980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在遵化县彻底平反一起所谓“篡权复辟”案件的报道中，更公开严厉谴责“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凌驾于党委之上，实行‘家长制’，大搞‘一言堂’，违犯党纪国法，造成了不少冤案错案”。其中单是1975年5月到1977年9月的历时两年又四个月的一个冤案，全县直接受审查、处理和株连的就有一百四十多人，其中判刑四人，开除党籍公职、戴坏分子帽子两人，开除党籍公职和给予其他处分的三十六人，被迫自杀死亡两人。而这个大冤案的起因，只不过是这位“前县委主要负责人”在一次县委常委会上自己宣布他将去地委工作，遵化县委工作将由县委副书记吴瑞全主持。县委机关一些同志就此议论说，这将是全县五十八万人民的大喜事。这位“前县委主要负责人”闻言“暴跳如雷，火冒三丈”，说这是“制造反革命夺权舆论”，“出反革命了，要抓反革命”；于是组织专案班子严加追查，